

回眸中国出版业（二）

马敏 主编



目 录

经济著作的出版	1
历史著作的出版丰收	15
语言文字学著作的出版成就	39
社会科学其它学科著作	48
自然科学技术图书的出版	58
基础科学专门著作的出版	61
工交建筑专门著作出版	81
农林科技专门著作的出版	109
医药卫生专门著作的出版	128

经济著作的出版

经济著作出版的情况分两个大阶段介绍。第一个大阶段是新中国的头十七年，即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十年遭受的破坏，放在第一阶段之后作简单说明。第二个大阶段是七十年代末期和整个八十年代的情况，这期间由于出书品种繁多，数量大增，因此需要分类叙述。

一、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和进行各项民主改革，经济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经济学著作的出版不多。一九五三年以前，主要出版了译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教材和研究提纲一类的教学用书；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仅出版了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狄超白的《经济学讲话》、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沈志远的《论政治经济学性质对象和任务》及魏子初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等有数的几种，此外还出版了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三个年份的《中国经济论文选》（前者为8辑，后二者各为上中下3册），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统计局编译的《国际经济论文选》。

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期间，工农业发展都较快，财经出版工作也有明显进展，出书品种增多，范围也有扩大。除大量翻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著作外，主要是出版了一批政治经济学和

有关财政、金融、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财务和会计等方面的书。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共3卷）、李聿恒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基本问题》、王思华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等，以及孙怀仁的《资本与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再生产》、孙执中的《帝国主义有哪些经济特征》、宋则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吴承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沈志远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及彭迪先的《货币信用论大纲》等。

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中国经济界的学者们在学习、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后，已注意到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理论问题，并从一九五四年起陆续出版了诸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苏星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蒋学模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漆琪生著）等一些著作。

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出版了郭瑞楚的《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朱剑农的《我国过渡时期的农业地租》、杨英杰的《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比例关系问题》等著作。还出版了一批反映新中国头几年经济建设成就和阐述中国实现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书。另外还连续编辑出版了一些经济资料汇编，如多卷集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和《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等。

在介绍外国经济建设方面，除出版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书以外，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书也出版了一些，有翻译的，也有中国学者自己写的。如〔苏〕科兹洛夫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及其在战后时期的尖锐化》、〔英〕阿·尔·康南著《英镑区》、美国劳工研究会编《亿万财产的美国大公司》、〔日〕宇佐美诚次郎著《日本垄断资本》，以及陈翰笙著《美国垄断资本》、陶大镛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徐秉让著《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书，主要是批判“计划资本主义”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现代马尔萨斯学说及凯恩斯理论等英、美经济学派的。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左倾错误影响下，出版界出版了大量宣传“浮夸风”、“共产风”等内容不切实际的经济书籍，产生了不良影响。

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纠正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发展国民经济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再次强调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使经济理论研究又活跃起来。理论界对比了五十年代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不少有水平的理论著作和专业书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高校财经专业方面的统一教材，有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上册），马洪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上下册），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下册），樊亢、宋则行主编的《外国经济史》（分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1—3

册)等;二是中国经济论著方面,有薛暮桥、苏星、林子力等著《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许涤新著《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和《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赵靖著《我国过渡时期地租性质》等;三是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有刘秉麟编著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杨端六编著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季陶达编著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杨培新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李建昌著《官僚资本与盐业》等。

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由〔苏〕卢森贝、〔苏〕瓦尔加、〔德〕卢森堡、〔日〕河上肇等人写的一批有代表性和有保留价值的外国学术著作。商务印书馆等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一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家(如〔英〕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瑞士〕西斯蒙第)的著作,庸俗经济学(如〔英〕凯恩斯)的著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如〔美〕萨缪尔森)的代表作,五、六年内共出版了几十种。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前半期,经济书籍的出版又渐趋兴旺。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推行极左路线,使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受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他们颠倒是非,把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财经图书诬指为宣传“唯生产力论”的“毒草”,因此“文化大革命”前期出版的经济书籍寥寥无几。

一九七二年以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出版工作开始出现转机,但仍然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二十多种经济著作,其中包括徐禾等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樊亢

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鲁友章、李宗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等高校教材。

二、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的情况

“四人帮”覆灭后，经济学界从经济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反动谬论，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专家、学者们思想逐步得到解放，认真研究了新中国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要求改革中国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新时期的这种新形势，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学家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济成就，对如何真正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和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索。与此同时，经济专业出版工作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经济图书的出版规律，力图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图书体系，以便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工作实践的实际情况。在这种生动活泼的情势下，经过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经济专业图书丰收的十余年，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未曾有过的。以一九八八年为例，这一年经济类新书共出版了 2774 种，占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种数的三分之一；而其中理论著作又占了总数的 90% 左右，且不乏理论水平较高、学术性较高的上乘之作。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著作和政治经济

学读本出版繁多。这十余年出版的经济图书的一个特色，是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和阐述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两类著作有较大的发展，出书的种类和数量繁多。在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著作方面，以专门研究《资本论》的书籍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的二十几年中，只出版了 10 余种，而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六的九年中，就出版了 80 余种。其中有郭大力著《关于马克思的 资本论》，王亚南著《资本论 研究》，王惟中、洪大 合著《资本论 专题研究》，漆琪生著《资本论 大纲》（共 3 卷），张魁峰著《资本论 浅说》，许涤新著《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于光远著《试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 c.v.m（读《资本论》的一个笔记）》，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编《资本论 与社会主义经济》等，这是一批较有分量的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5 集《资本论 研究资料和动态》。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资本论 研究丛书》，共 24 种 30 册，内容包括关于《资本论》原理及手稿的研究，关于《资本论》的结构、逻辑、方法、创作史和传播史的研究，关于《资本论》中的哲学、文学、数学、管理科学的研究，以及有关《资本论》的辞典、索引、文献图片等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资本论》研究领域中的各项基本问题，对推动学术界深入研究《资本论》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一九七九年以前只出版了 30 多种，大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是释义和解说性的入门书。一九七九年和八十年代，这类读物出书数量激增，其中尤以教材居多。为了满足中等和高等、正规和业余等各种教学的需要，各有关系统、

各地区和不少高等院校，都编写出版了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有的还成套、成系列，蔚为大观。据有人在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统计，不到五年就出版了 158 种之多。这些教材的优点是，多数能摆脱老框框，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有不少质量较高；缺点是太多则滥，有的质量不高，甚至有抄袭、雷同的现象。在这些教材中，叙述资本主义的有好几种，但以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共 3 册）较受欢迎，印数较多。叙述社会主义的，则以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组和北方十三所大学编写组分别编写的两种同名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较多的高等学校所采用。这两种教材比过去出版的同类教材，在联系实际、理论分析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而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书，则以论述简要见长，使用得最广泛。其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宋涛、卫兴华著《政治经济学》，徐禾、李光宇等著《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经济形态》，厉以宁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这一时期也翻译出版了苏联的几种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东欧一些国家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这些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方面图书的出版，比以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例如一九七九年以后陆续出版的邓力群著《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和《谈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张问敏、张卓元、吴敬琏合编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下卷），马洪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苏星著《计划·市场·价格》等一批著作，就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这方面经过深入研究后

所获得的成果。

（二）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个时期出书的另一特色，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专著，尤其是综论性著作越来越多了。从一九七八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胡乔木写的《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物质利益》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写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和林子力、有林写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等书。这些著作在经济界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此后，一批学术、理论水平较高的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力作相继问世。如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孙冶方著《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增订本）和《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于光远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共4册），许涤新著《广义政治经济学》（共3卷，修订版），马洪著《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等。这些著作的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它们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理论界普遍的好评。其中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九八一年出版）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三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提出经济调整 and 改革的建议，见解精辟、持论中肯，被学术、理论界和经济工作者认为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很好的一部重要著

作，受到中外读者广泛重视，很多大学将其列为教材。该书累计印数近千万册。孙冶方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九七九年出版）一书中所阐述的重要观点，即要充分肯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见解，他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了，虽曾遭到错误批判而仍坚持不变，这是孙冶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还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要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领导经济等。这部著作从学术上、从对经济工作的实用意义上来说，都有它的重要价值。孙冶方一九八三年去世后，经济学界还编辑出版过几种研究他经济理论的文集。

（三）有关经济体制改革著作的出版有新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树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经济理论界和经济专家积极地参与讨论和研究，不少人并著书立说，总结新中国头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得失，着重研究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课题，探讨今后发展的方向。于是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书（包括通俗读物）纷纷出版，据估计，十年当中共出版了 1000 余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下册，马洪、孙尚清主编）。该书是在组织 600 名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用十个月时间调查了十几个省市的情况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而写成的。它对改善中国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对达到合理性所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接着先后出版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编写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验选编》等书。这些书籍的出版，对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

训、促进当前的工作，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随着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有关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模式》、王珏等主编的《经济体制改革答问》、红旗杂志编辑部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段若非编《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探讨》等。这些著作对上述《决定》的精神实质、理论上的突破，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等，都做了全面的阐释。在一九八四、八五年以后，还出版了部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专著如刘国光著《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孙尚清主编的《论经济结构对策》、王琢著《中国式的经济体制研究》、马洪著《探索经济建设之路》、李忠凡等编《城市和经济区》等。论文集如有林等编《经济改革文丛》（1—4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问题论集》等。

在全国性的经济调查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过程中，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已走在前头，很快在全国农村铺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随之也出版了一批介绍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书，如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编《农业经营管理经验选编》、红旗杂志编辑部编《八十年代初的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报告选编》等。这些书在全国范围内介绍和推广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林子力著《论联产承包制——兼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蒋励主编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陆子修著《农村改革的哲学思考》等，则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理论问题。这些著作的出版，对总结、巩固和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

体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对一些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经济学界进行了探讨研究，也有著作出版。如对计划体制改革和市场问题，出版了魏礼群、韩志国编著的《计划体制改革问题论争》，蒋一苇等著《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开拓》，田一农等著《论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财政部教育司编《中国财政改革》，杨慎、王弗编《建筑业体制改革的新阶段》等。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经济界开始进行了虽属初步但系全面系统的总结。高尚全著《九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周太和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种）等书的出版，对国内外人士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很有帮助，对深化改革也有积极意义。此外，总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以下地区、县等经济改革经验的书，也出版了数十种。

八十年代还出版了一些由中国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开放的著作，如千家驹、卢祖德主编的《特区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尤楚材主编的《利用外资概论》，刘向东等著《我国利用外资概况》等。

（四）研究、介绍外国经济的著作。这方面的书籍过去出版不多。七十年代初，中国对外关系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出版社曾先后编辑出版《国际经济知识丛书》两种和《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使读者耳目一新。进入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更加需要了解世界经济方面的情况，于是有关出版社除了继续出版《国际经济知识丛书》（《利

用外资知识》、《技术引进知识》、《国际经济组织知识》、《补偿贸易知识》等)数种和《世界经济统计简编》，还出版了多种这方面的新书。如钱俊瑞的专著《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世界经济》(共3册)，和一套《大学世界经济丛书》(已出版了《世界经济概论》上下册、《国际贸易概论》等几种)。已出版10种的《外国经济概况丛书》，则分别介绍了东南亚五国和印度、拉丁美洲、非洲、西欧等国家的经济情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知识丛书》，是向厂长、经理等企业家介绍国际贸易、国际市场、国外先进企业管理方法和经营之道的，一九八七年出版了第一批10种。

为了了解和借鉴外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经验和教训，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版了一批介绍有关外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书籍，如马宾译《苏联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周新城著《匈牙利经济体制研究》、王守海主编的《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比较》、龙善德编著《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从比较中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专著，如张培刚、厉以宁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被认为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人民出版社制订了一套《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的选题，已出版十来种，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五)其它经济图书的出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最终目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出版界注意出版研究现代化建设的著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于光远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九七七——一九八) (共13册)和(一九八——

一九八五)两套书。其它著作则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南》(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和《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国农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室编写组)、《专业户与我国农业现代化》(王松霈著)等专著。此外三联书店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相继出版了《国外工业现代化概况》、《国外农业现代化概况》、《日本工业现代化概况》等书以资借鉴。

在八十年代期间,出版了一批经济史方面的有分量的专著。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已出2卷),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已出4卷),胡如雷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谷霁光著《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下册),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孙健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赵靖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周伯棣著《中国财政史》,童书业著《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等。《当代中国》丛书中,也已出版了《当代中国经济》、《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等卷。

为了研究和积累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财富,出版了《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许涤新经济文选》等著作。

一九七九年以后,部门经济学著作的出版也有较大的增长,十年中先后出版了100多种,包括各经济部门、各行业以及财务和监督等方面的著作。八十年代后期,还出版了一些部门经济学新学科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原理》、《企业经营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探索》、《森林生态经济学》等等。但是这方面的

图书还有很多缺门，尚需理论界和出版界继续作出努力。

（六）外国经济著作的翻译出版。“文化大革命”以前，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的，只有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少数出版单位，出书数量总的不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不仅原已承担外书翻译出版任务的一些出版社，而且许多地方综合性出版社和高等院校出版社，也都投入到翻译出版包括经济著作在内的外国学术著作的行列中来。因此，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著作不但品种数量增多，而且注意到了对各分支、各流派、各个国家的经济类著作的引进和介绍，加强了出书的计划性和系统性。

就拿商务印书馆来说，它在译介外国经济著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近代、现代外国经济学各流派的重要著作，有计划地出版外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著作。他们通过择优新译、缺门补齐、旧译重印或修订再版等方法出版了一大批外国经济著作。该馆在所承担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4辑200种）内，经济类著作有48种，占24%。其余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新出版了《配第经济著作选》、《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0卷本，已出第1—4、6、8卷）、《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布阿吉尔贝尔选集》等；在近代、现代外国经济学著作方面，新出了〔美〕萨缪尔森著《经济学》（第十版）上中下册、〔英〕西尼尔著《政治经济学大纲》、〔爱尔兰〕康替龙著《商业性质概论》等；在经济史方面，新出了〔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册）、〔俄〕罗斯托夫采夫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英〕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三卷）等；此外还出版了〔英〕希克斯著《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

〔美〕托宾著《十年来的新经济学》、〔日〕都留重人著《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苏〕查尔科夫著《二百家俱乐部》等。

其它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著作和各流派的著作，如〔法〕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版〕、〔美〕W·H·纽曼等著《企业战略》（贵州人民版）、〔匈〕科尔内·亚诺什著《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版）、〔日〕石川馨著《日本的质量管理》（中国经济版）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套《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包括《生产与经营管理》（〔美〕E.小亚当等著）、《科学管理原理》（〔美〕F.泰罗著）等7种。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共有10多册，是研究苏联经济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经济图书的出版工作确已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出版了不少的好书，但也应该指出，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盲目地翻译出版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派著作，有的甚至吹捧西方经济理论，虽属极少数，却十分有害。这些问题自八十年代末期已有改进。

历史著作的出版丰收

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四十年的耕耘中，不断地取得了进展。体现这一成果的历史图书的出版获得了丰收，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九四九年秋至一九六六年夏“文化